

SICHUAN DAXUE ZHE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I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劳动 与姐妹分化

——中国女性农民工个案研究

何明洁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DAXUE ZHE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I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劳动 与姐妹分化

——中国女性农民工个案研究

◎ 何明洁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曾春宁
责任校对:蒋姗姗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动与姐妹分化:中国女性农民工个案研究 / 何明洁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5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ISBN 978-7-5614-4330-9

I. 劳… II. 何… III. 女性—商业服务—服务人员—研究—中国 IV. F7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7429 号

书名 劳动与姐妹分化
——中国女性农民工个案研究

著 者 何明洁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330-9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6.75
字 数 14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目 录

第1章 引 言.....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文献回顾	(7)
1.2.1 劳动过程研究	(7)
1.2.2 社会学视野中的服务业研究	(14)
1.2.3 女性农民工研究	(21)
1.3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25)
1.3.1 方法的选择	(25)
1.3.2 和记酒楼	(28)
1.4 全书主旨与篇章结构	(36)
第2章 “和记”生产政体的形成.....	(39)
2.1 从“女性年龄感”到“性别化年龄”	(44)
2.2 国家的力量：发展餐饮业与劳动者的制度性身份	(48)
2.2.1 最佳旅游城市和成都美食	(49)

2.2.2 农民工的制度性身份	(50)
2.3 市场的力量：服务的竞争	(52)
2.3.1 性别消费：感觉的消费	(53)
2.3.2 劳动力市场状况：“性别化年龄”与竞争力	(56)
2.4 劳动力再生产：“姐妹分化”的根源	(58)
2.4.1 劳动力的省内流动	(58)
2.4.2 “性别化年龄”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分裂	(61)
2.5 “性别化年龄”与劳动分工	(64)
2.6 小结：“性别化年龄”与生产政体的分化	(67)
第3章 软硬兼施的分化控制	(70)
3.1 简单控制与复杂控制	(71)
3.2 直接管理	(72)
3.2.1 身体控制：去性别化与性化的身体	(74)
3.2.2 空间控制：幕后与台前	(77)
3.2.3 精神控制：去技术化与情感劳动	(79)
3.2.4 规训越界与自我驯化	(81)
3.3 怀柔策略	(84)
3.3.1 内部劳动力市场	(85)
3.3.2 内部沟通机制	(90)
3.3.3 工会的作用	(92)
3.4 小结：分而治之的工场治理术	(95)
第4章 形式多样的日常反应	(98)
4.1 抗争，还是表达？	(100)
4.1.1 抗争的分类	(100)

4.1.2 对剥夺的感受	(101)
4.1.3 隐蔽的“防御性表达”	(103)
4.2 缺乏集体抗争的工场	(104)
4.3 日常的个体表达	(109)
4.3.1 拒签合同：不约而同的集体表达	(109)
4.3.2 粗话与黄话：个体宣泄的口头表达	(111)
4.3.3 更衣室的集体狂欢：空间的表达	(116)
4.4 分化的策略性反应	(117)
4.4.1 大姐的反应形式：城市过客的处事之道 ...	(118)
4.4.2 小妹的反应形式：新市民梦想的建构	(123)
4.5 小结：分化的日常表达	(132)
第5章 分裂的认同.....	(135)
5.1 含义复杂的工作	(136)
5.1.1 工作与自信	(136)
5.1.2 保护性炫耀	(139)
5.1.3 工作的阶段性意义	(141)
5.2 与顾客矛盾含混的认同	(146)
5.2.1 选择性认同	(147)
5.2.2 回避女性顾客	(152)
5.2.3 与顾客的负面互动	(154)
5.3 分裂的姐妹认同	(157)
5.3.1 生产政体间的认同分裂：大姐与小妹之间	(159)
5.3.2 生产政体内的认同分裂	(160)
5.3.3 纵向的认同分裂	(165)

5.4 小结：劳动与分裂的认同	(170)
第6章 总结：年龄的社会性别建构.....	(173)
6.1 性别之间：男性员工的角色	(173)
6.1.1 男性的技术垄断	(176)
6.1.2 男服务员的补充性角色	(180)
6.2 年龄之间：群体划分的连贯性	(185)
6.3 建构过程：实施主体的常识性行为	(189)
6.4 扩展的层面：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服务业 生产政体研究	(191)
6.5 结语：作为起点的结束	(196)
参考文献.....	(199)
后记.....	(212)

第1章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2004年7月，明晃晃的骄阳和聒噪的蝉鸣把我寝食难安的焦灼渲染得“有声有色”。刚刚完成博士论文选题的我率先体验到论文题目所指的状态：“女性农民工的身体与焦虑”。我不是女性农民工，不过身体对情绪变化最本能、直接的反应想必跟我的研究对象也有某些共通之处。焦虑的来源在于对题目的操作化：既然是一项对身体与焦虑的社会学研究，那么就应该给研究对象设立一个行动发生的具体场域。而我的困扰正在于：在什么样的场景中来开展这项研究？

据说吃和购物是女性惯常的发泄方式，苦思无果的我决定和朋友到京城一家著名的火锅店大快朵颐以解烦忧。这家火锅店在网络上好评如潮，被誉为“服务和味道的完美结合”。满怀抚慰身心的憧憬，我们不到6点就到了这家店门口。

遗憾的是，虽然我们来得早，比我们还早的大有人在，前面的食客已经开始排号，轮到我们的号码是“小桌 29”。附近没有其他的选择，又很好奇该店生意为何如此火爆，我们耐着性子加入等位的行列。

果然像一位网友所说，“等位子都是一种享受”。我们刚落座，等位区的服务生马上热情洋溢地报出一大堆棋牌名称和饮料品种。我们要的飞行棋和橙汁很快拿上来，之后不时有服务生加饮料、添虾片。这家店最绝的地方是在等位区提供免费美甲和擦皮鞋，小摊四周围满了等待服务的食客。

等位子的过程因为饥肠辘辘倍感漫长。催问排号的服务员，每次得到的都是令人失望的回答和让你不忍责备的超级好态度。我们在去与留之间彷徨，又一次次被迎宾小姐温柔有策略的安抚打消了离去的念头。

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苦等，终于迎来出头之时。被服务员领往座位的一路上，不断有迎面经过的员工向我们微笑点头问好，那热络的态度让我们久等的郁闷被一点点化开，就像多日不见的老友同你亲切致意。穿过火锅店长长的过道后，热情招呼所带来的温暖逐渐变成一种不适应：陌生的服务员传达出的是熟人间的热络，过分的殷勤让我不敢再跟他们四目相对。接下来的餐中服务也是名不虚传的周到：只要顾客稍微举手示意，马上就有服务员上前应答。他们通常一上来就是一个微微的鞠躬，然后满面堆笑询问要求，离开前又要微微鞠个躬，极尽礼貌之能事。一顿饭吃下来，我忘了来这里是为了慰劳身心，倒是对热情得过头的服务员有些心怀歉意，仿佛自己那些添菜加水的要求给他们增加了麻烦，心里感觉比他们还累。当

我在温暖如故的送客声中走出火锅店时，真是如释重负。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来消化吃火锅积攒下的忐忑情绪，吃了饭却好像欠了情，付了钱却仿佛欠了债。那些服务员谦恭的身影不断从我脑海掠过，暖人心脾的问候在我耳边此起彼伏，熟悉与陌生的错乱让我无所适从，一连串问题迸发出来：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表现得如此温顺？什么样的训练能让每个人呈现千篇一律的谦恭？每个人被改造成这样需要多大的努力？他们如何适应自己的改变……

这顿让我情绪上消化不良的火锅最终启发了我博士论文的切入点，在卷帙浩繁的农民工研究中还很少见到以服务业农民工为主体的研究作品。而在那些不以加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大多数内陆城市，服务业是吸纳农民工的主要渠道，其中又以女性农民工居多。她们散布在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与我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却如此默默无闻，成了农民工研究中被忽略的群体。于是，我把论文研究发生的场所放在了属于传统服务业的餐馆，通过对餐馆女性农民工的参与观察来探究她们的身体与焦虑来源。

进入我的调查点“和记”后，我的感觉又经历了一次错乱：店里一百来号女工，究竟哪些属于我们日常所指的“女性农民工”，哪些不是？按照定义，这些户口在农村、来城市打工的女性都属于“女性农民工”，但她们展现给我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千姿百态，似乎又很难将她们归到一个统称之下。酒楼高度分化的“女性农民工”群体几乎让我对这个统称的意义产生怀疑。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从普通服务员、保洁员、迎宾员到领班、部长、前厅经理表现出的分工和等级的差别，还鲜明

地表现在“和记”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中——比如管理上，有的部门噤声慎言，有的部门却鼓励“展现自我”；生活中，有的女工克勤克俭，有的却把享受生活视为工作的动力。女工们在“和记”工场自然分化成“大姐”和“小妹”两个阵营，她们在处理与资方、与顾客、与家人和对未来的各种关系中表现出种种明显差异。

一般人也许会用生理差异、经历差异来解释分化的原因，但通过对女工处境、烦恼、喜好的关注，我发现我们必须对她们采取更细腻的分析，答案远比通常列举的这些原因更为复杂。“和记”姐妹群体的差异引起了我的研究兴趣，最终让我从对她们身体和焦虑的关注转向对她们群体分化机制的探究：什么原因造成“女性农民工”姐妹群体的分化？她们的差异是事先就存在还是产生于劳动过程？她们自己如何认识彼此的差异？

也许“大姐”和“小妹”的分化给人最直观的感觉是年龄的分野，但年龄的差异为何没有在男性员工身上体现出如此强烈的区别性？那又是什么因素使年龄的差异在女性农民工身上变得有意义？这差异如何体现和影响到她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进一步的观察可能会让人提出“大姐”和“小妹”的分化是因为她们从事不同的工种，劳动分工导致群体分化。那么分工的依据和原则是什么？由谁来决定？分工和她们的年龄有没有关系？“大姐”从事的工作同“小妹”从事的工作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不一样？

再往下追问，如果年龄和分工还不够解释力，那么“大

姐”和“小妹”的分化是否同行业有关？从韩启澜（Emily Honig）、罗丽莎（Lisa Rofel）笔下的纺织女工到李静君（Ching Kwan Lee）、潘毅（Pun Ngai）等人研究的珠江三角洲工厂打工妹，学者们对工厂女性展开了深入分析。服务业迥异于制造业的行业特征会对女工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影响到她们的工作表现？是不是会改变她们形成认同的机制？餐饮业的特点能不能解释“大姐”和“小妹”的分化？

在不断追寻“和记”姐妹分化原因的过程中，我的研究逐渐转向从性别视角开展劳动过程分析。布洛维（Michael Burawoy）^① 的生产政体理论（production regime theory）给我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我发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性别和代际因素对劳动者所处的生产关系有深刻影响，导致资方对不同的劳动者采取不同的控制管理方式，形成不同的生产政体类型，而这又反过来参与了劳动者类别归属的再生产。具体来说，“和记”资方对扮演贤妻良母角色的“大姐”和富有女性青春活力的“小妹”实施差异化的分工：内化了女性气质（femininity）但外形不再性感的“大姐”被分配从事去性别化的劳动，外形充满女性特征但价值观念尚未定型的“小妹”被分配从事性化女性气质的工作。资方通过拆裂使用女性气质的内在与外在方面，来确保剩余价值的生产，造成女性内外合一

^① Michael Burawoy 的中文译名有两种译法，一种是中国台湾林宗弘等人翻译的“布若威”，另一种是一些大陆学者采用的“布洛维”。本书行文将全部使用“布洛维”这个译名，而引文则尊重译者的翻译。文中其他外国学者的中文译名除了本人已有中文名字的使用其中文名字，其他学者的中文译名均参照新华社译名室 1993 年出版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

的主体性分裂。而将女性气质内外结合得最好的“已婚小妹”成了“和记”女工中最矛盾、最困惑的群体，她们深知餐饮行业“青春饭”吃不久，却不知道未来该去向何处。

总的来说，本书的研究产生于现实的提问：服务业女性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是什么样？当前的农民工研究对这个问题少有问津，它从而成为本书的努力方向。“进城打工”在农民工的日常表述中已经成为一个常用词组，由劳动入手开展研究无疑抓住了他们以流动为特色的城市生活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劳动研究的经典命题是：劳动过程如何被组织，以便劳动力转化为劳动？本书将同样紧紧围绕这个核心展开。“服务业女性农民工”议题涉及行业、性别、身份，为了沟通微观个体与宏观结构的联系，笔者采用生产政体理论为全篇分析框架。为了凸显劳动者的性别特征，笔者将对性别和年龄的社会建构切入到劳动过程中分析，发现女工工场外的社会、文化身份在劳动过程中对她们的工作表现有深刻影响，而此种差异被资方整合为工场治理术的一部分，一方面强化了女工的社会类别划分，另一方面将工场的生产政体分化成了不同的类型，便于对劳动者分而治之。

简而言之，本书是将性别视角、行业特征和身份制度融入劳动过程研究的一次尝试，笔者试图解释那些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看似属于劳动者个体特征的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以便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加深我们对社会学中的劳动理论之理解。本书所讨论的女性农民工在身份、性别、年龄、待遇和就业等问题上的特殊遭遇将紧紧嵌入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内。

1.2 文献回顾

本书的分析框架来自三方面的基础：以生产政体理论为代表的劳动过程研究、社会学视野中的服务业研究和我国农民工研究的部分成果。全书以生产政体理论为分析工具，剖析资方在劳动过程中对不同工人群体采取的不同控制方式、劳动者的应对策略和“共识”（consent）的生产。对服务业研究成果的运用在于揭示服务业有别于工厂环境的独特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关系。与农民工研究的对话在两方面：一是借鉴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探讨社会性别的因素对女性农民工就业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影响；二是通过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对话，提出农民工代际研究应注重“性别化年龄”的作用。

1.2.1 劳动过程研究

劳动过程理论源自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掩盖过程的揭示。马克思通过区分劳动力和劳动的差别，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是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特别强调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因为生产关系影响到劳动力在生产使用价值时被塑造和控制的方式。劳动过程如何被组织以便劳动力转化为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研究的核心问题。但是，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论述没有明确阐释劳动者主体性（subjectivity）、利益、控制等基本概念，这些未被检视的领域成为后继学者研究的起点（Lee, 1998）。

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时代，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 于 1974 年发表了《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ism*)，阐释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他强调管理手段对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性，研究了现代管理技术在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共同作用下，如何确保工场劳动力真正的从属和“去技术化”(deskilling)。布雷弗曼指出，现代化的机械大规模生产使劳动者遭受“概念与执行的分离”(the separation of conception and execution)，他们不再像工业革命之前的工匠那样拥有技术和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而是被现代化管理和机械生产剥离成为单纯的劳动力。布雷弗曼的研究掀起了劳动过程理论领域的“布雷弗曼症候群”(Bravermanian)。对他的批评认为，他把阶级作为一个抽象的经济概念局限在客观性的分析框架中，忽略了工人在资本主义转型中的斗争和反抗，把劳动者的主体性全面剥离(Knights et al, 1990)。

布雷弗曼之后的劳动过程研究开始关注劳动控制的各种变化形式，将劳动者的主体性带回分析中心成为突出的研究趋势，这其中杰出的代表是布洛维的生产政体理论。布洛维将工场中的微观政治与工场外的宏观政治经济勾连起来，在《生产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中提出了“生产政体”理论。^① 生产政体是生产中的整个政治形式，包括劳动过程的

^① “生产政体”(production regime) 在布洛维的《生产的政治》中被具体化为“工厂政体”(factory regime)。笔者认为，“生产政体”强调概念和理论涉及的事件与关系，“工厂政体”强调发生场所。为了避免在本书中使用“工厂政体”造成误会，因此全书都使用“生产政体”来概括本书研究的工场政治 (politics on the shop-floor)。

政治影响和生产的政治工具 (Burawoy, 1985)。布洛维通过区分“生产关系”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劳动过程中围绕剩余价值发生的剥削关系) 和“生产中的关系” (relations in production, 劳动者在生产活动和劳动过程中建立的各种关系), 提出资本家取得并同时掩盖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资方不仅要借助“生产关系”, 而且需要“生产中的关系”共同实现。因此, 任何生产 (work) 都包括了生产物品的经济维度、生产社会关系的政治维度和生产对这种关系的经历的意识形态维度三个方面 (Burawoy, 1985)。布洛维认为, 生产政体受四个因素影响: 国家干预、市场竞争、劳动力再生产和劳动过程。它们的共同作用形塑了工场工人斗争的方式和能力, 后者对生产政体有反作用, 从而推动劳动过程和生产政体的变化。

布洛维将生产政体外的宏观力量与劳动过程中工人的主体性联系起来, “在劳动过程理论中引入了工厂中政治与文化霸权的生产, 是对这一理论的重大贡献。”(李洁, 2005a) 后继学者对布洛维的批评集中在两点: 一种批评认为, 生产政体理论容易导致把外部力量看作稳定的外在因素, 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固定的必然联系, 而忽视了外部力量与劳动者主体性、工厂政体之间动态作用的过程; 另一种批评认为, 布洛维笔下的工人虽然恢复了主体性, 却是以整体性的面目呈现在劳动过程中, 没有注意到种族、性别等非阶级因素对劳动者主体性的影响。后者在他的学生李静君的《社会性别与南中国奇迹》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中得到了补充和修正。

李静君的南中国女性研究在布氏理论模型中加入了性别和劳动力市场社会组织的维度。通过分析同属一家企业在香港和深圳的两个分厂，李静君发现相同技术过程的工厂形成的是截然不同的生产政体：在香港是“家庭霸权”，在深圳是“地方专制”。在香港和深圳，国家力量对企业的影响力度比不上地方机制，地方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组织决定了劳动力对资方的依赖程度。两地生产政体分化的原因在于，女性进入地方劳动力市场的过程是性别化的，她们分别依赖家庭（香港）与地方（深圳）网络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导致对资方的依赖程度不同，资方因之对她们实施不同的控制和管理方式。李静君通过把生产政体中“劳动力再生产”这个变量性别化，把女性主义视角切入生产政治，揭示出工厂政体的性别基础（Lee, 1998）。

劳动过程理论自 20 世纪 80 年代全面复兴，有两条线索能帮助我们把握其发展脉络，它们也关系到本书对该理论的继承和推进：一条是劳动者主体性逐渐回归的趋势，另一条是对劳动过程之外的因素之于工场政治影响的关注。

1.2.1.1 “将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

从马克思到布洛维、李静君，劳动过程研究中工人的形象变得逐渐清晰、生动。马克思从生产关系产生阶级对立的角度看待劳资互动，“他提出的从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的模式，即阶级结构决定阶级意识与阶级形成的模式为后来工人阶级形成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范畴。”（吴清军，2006）在这个模式中，工场和劳动者的个性特征被抽离，劳动者在生产和社会